

第一章 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

—— 苏共失去政权的深刻教训剖析

一、苏共失去政权的历史回顾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上台之初，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上，但困难重重，无法打开局面。从1988年起，转而进行政治改革。在政治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提倡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和苛刻谴责，造成了否定革命历史、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严重后果，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

1990年，苏联局势动荡不安。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潜伏已久的民族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倾向日益严重。1990年，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接着，俄罗斯带头发表“主权宣言”，其他9个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发表“主权宣言”，宣布本国是主权国家。同时，苏共党内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公开化。

1991年前后，在政治领域，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思潮已经“合法化”，气焰嚣张。有500多个形形色色的政党和大量“非官方组织运动”登上政治舞台，其中多数打着反共旗号。当时苏共党内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叶利钦不失时机地打出了“反对特权、反对苏共剥夺人权”这张牌，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响应。苏共内部急剧分化，党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先锋作用和战斗

性，威信和影响大大下降，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有 400 多万党员退出苏共。

1991 年 3 月，苏联就是否保留苏联举行全民公决，75% 的公民表示赞同保留联盟和原国名。此后，戈尔巴乔夫与原联盟一些共和国领导人，就签订新的联盟条约进行磋商。8 月，《苏联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公布。条约将苏联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并把它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这激起了党内一些高级干部的强烈不满，党内的斗争急剧尖锐化。就在条约即将签署的时候，爆发了党内一些高级干部企图控制局势的“8·19”事件。^①

1991 年的“8·19”事件，应该说是苏共挽狂澜于即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8 月 19 日凌晨，塔斯社发表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鉴于总统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欠佳，即日起由他本人履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已“进入死胡同”，国家“面临致命的危险”。但是由于政变的领导者仍然是苏联的特权阶级，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领导者却未能得到人民（包括 1500 多万名党员）的支持。8 月 18 日这天是周末，叶利钦等人都在乡间别墅休假，本来可以很轻易地被控制起来。但被派去逮捕叶利钦的克格勃最精锐的反恐怖特别部队“阿尔法”小分队，除了组长一人外，全体成员都拒绝执行命令，听任第二天早上叶利钦闻讯后，率领他的车队从小分队眼皮底下开过去，进入俄罗斯议会大厦去从容地部署反击。机场没有被关闭，议会大厦对外的电话联络也没有被掐断，叶利钦可以自由地和西方各国领导人通话，争取援助。士兵不肯向市民和叶利钦的支持者开火，被派去

参见金鑫，徐小平：《中国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10 页。

攻打“白宫”（即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也按兵不动，甚至发生倒戈，许多坦克调转炮口。叶利钦登上坦克仅仅发表了十分简短的演说就挫败了这场政变。叶利钦声明接管俄罗斯境内的全部苏军，命令所有部队返回原驻地，不要参与政变，控制了局势，局势变得对紧急状态委员会不利。21日晚上，戈尔巴乔夫声明他开始“完全控制局势”，为期3天的“8·19”事件结束。

事件结束后，国内外有很多人批评事变的发动者优柔寡断，没有采取坚决措施控制要害部门和逮捕政敌。其实这些说法并不准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并不乏有经验的党政军和内卫部队领导人。但当时出现的形势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很多人都选择了支持退党的叶利钦和民主派。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发出的命令无论在党内、政府内，还是在军队内几乎没有人执行。因此挽救苏联的最后努力就流产了。

“8·19”事件改变了苏联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叶利钦及其支持者迅速掌握了国家大权。苏共被排挤出政权，国家政治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共被迫解散，苏共的4228座办公大楼、180个社会政治中心、16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及大量银行存款，都被俄罗斯当局查封和没收。而查封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俄罗斯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也或被解散，或被禁止活动，或改名为社会党。^①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中央电视台发表声明说，由于当前国内形势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建立，他决定停止在苏联总统职位上的活动。7时38分，那面为几代苏联人熟睹的镰刀锤子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徐徐下落。就这样，由列宁亲手缔造的一个执政70余年的政党，就这样凄凉地谢幕了。

参见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7~10页。

二、苏共失去政权的原因分析

苏共的失去政权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必然性。江泽民同志指出：“苏联经过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发生了剧变的悲剧，最后解体了、垮台了，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和教训需要全面深刻地加以总结。”^①江泽民同志还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始终注重总结历史，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道路与经验，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把这些问题思考和研究清楚了，我们党就会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更好地领导人民在新的世纪谱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②中国有句古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深刻剖析苏共垮台失去政权的原因和深刻总结苏共垮台丧失政权的教训，无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地执政为民。

唯物史观认为，重大的历史事变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像苏联演变这么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变，不可能是由一、两个原因造成的，而必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苏共失去政权的原因，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来分析。关于内因方面，自前苏联“8·19”事件之后，我国的分析已较多，本书不再重复。而目前由于全球互联网的出现，使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渗透更加容易，着实令人担忧。因此，较详细地分析一下当年西方国家对前苏联如何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措施，以及这些图谋如何一步步得逞的历史，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故本章以苏共失去政权的外因为重点进行探讨。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 页。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00 年 1 月 14 日），载《人民日报》，2000-04-02。

1. 和平演变战略的由来及其发展

最早提出和平演变构想的是美国乔治·凯南。1947年1月，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提出了在阻遏苏联势力扩张的同时，通过和平方式改变苏联社会制度的设想。在他看来，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凯南认为，苏联的软化趋势出现以后西方就可以“期待一个与今天大不相同的俄国政府”。凯南提出的“遏制论”与“软化论”，为杜鲁门制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手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期，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继承和发展了凯南的思想，在强调“对侵略者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同时，提出了所谓“旨在和平取胜”，以“解放铁幕后的卫星国家”的思想，从而把和平演变由一般的政策思想发展为美国的基本战略。苏共二十大召开和波匈事件发生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动荡，让杜勒斯深受鼓舞，感到“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1957年7月2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身上的战略图谋。

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和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美国当局认识到用战争手段消灭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接受杜勒斯的主张，把“遏制政策”改变为“解放政策”。此后的历届总统都继承了杜勒斯的衣钵，不但通过和平演变战略消灭、融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目标更加明确，而且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促成演变。

20世纪60年代入主白宫的肯尼迪，执行了一手抓橄榄枝、一手抓剑的对外政策。他总结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遏制、围堵难以达到逐步演变目的的教训，提出了“通过接触促进变革”的主张。1969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从“以接触促演变”达

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出发，进一步调整了美国对外战略的侧重点。在他看来，增加贸易和接触，能够促进苏联集团内部的和平演变，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力量的影响越大。尼克松时期，美国开始了“从对抗时代向谈判时代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政府认为，美国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制止苏联的全球野心”，积极主张对苏联推行实力政策，恢复对苏联的遏制，即实行新的遏制政策。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攻势，“鼓励苏联及其附属国的自由化倾向”；帮助苏联、东欧的“民主力量”建立起“独立的工会、教会、政党、报刊和司法机构”，并通过培植这些“民主的基础结构”，最终使苏联、东欧实现方模式的民主化。1989年5月，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布什便根据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是积极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扩大联系与合作，诱压兼施，促使苏联东欧同过去的政策彻底决裂。

2. 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手段

西方国家在保持强大军事威慑力量的前提下，依仗他们的经济实力，通过利用现代新闻传播媒介和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思想、文化的渗透，诱压兼施，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归纳起来，西方国家在和平演变的手段和具体策略上，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利用现代新闻传播媒介作用，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用资产阶级价值观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在推行和平演变策略的过程中，美国历届当权者都十分重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作用，特别是重视广播、电台等新闻传播媒介的作用。他们在文化意识领域渗透的重点，一是宣扬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攻击社会主义国家

是独裁专制制度、压制民主、违反人权，推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二是宣扬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和经济制度；三是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 散布社会主义“危机论”、“失败论”、“破产论”，制造思想混乱，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煽起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满和敌对情绪。尼克松于 1988 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等，就是这种舆论的代表。

(2) 在经济领域利用各种经济手段诱压兼施，促使苏联发生质的演变。

近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写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披露了大量材料，证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政府雇用一大批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瓦解苏联的“软战争”战略，先千方百计地迫使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再设法动摇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里根政府策划通过“星球大战”和核恫吓逼迫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说服沙特阿拉伯等国压低石油价格，蓄意枯竭前苏联的外汇来源制造经济困难。戈尔巴乔夫没有察觉到美国的用心，也没有深入分析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将经济增速趋缓全部归罪于自身的制度，正好误入了西方动摇其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

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是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片面地认为问题出在政治体制方面，认为苏共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是阻挠改革的绊脚石，因此，他决定要以“民主化”和“公开性”为手段来进一步推动改革。到 1988 年，国内已乱得一塌糊涂，改革走进了死胡同，经济形势日趋严峻，食品、消费品供应缺乏，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民族矛盾加剧，非正式组织迅速发展，党内思想严重分

歧。面对这种情况，他不想改变做法，到人民群众中寻找支持，而把依靠西方看成是唯一的出路。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然是大力支持苏共党内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活动，因为他的改革符合西方的利益。为此，他们给予戈尔巴乔夫许多荣誉，包括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

1991年7月，鉴于苏联局势的危急，戈尔巴乔夫趁西方七国首脑会晤之际，向西方大国乞求经济援助。西方七国因他提交的改革计划过于笼统，不符合西方的要求，拒绝给以援助。于是，会议期间，戈尔巴乔夫与西方七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最后达成了援助协议，但西方的条件是：苏联必须在政治上同意苏联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实行分权；如果加盟共和国要求退出苏联，也不动用武力干预；经济上要进西方市场机制，向市场经济转化，实现全面私有化。英国一家报纸评论说，伦敦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可以说是给苏联唱了一支“埋葬”社会主义的“安魂曲”。

(3) 在政治上进行颠覆，通过扶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达到篡政夺权的目的。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十分注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亲西方势力，收买、扶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资助了一大批前苏联知识分子前往考察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正如前国务卿舒尔茨在1982年10月18日美国国务院召开的“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议上所说：“美国要利用人权口号和民间组织援助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势力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他强调：“共产党国家民主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应该是其内部势力。”所以，他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新工具、新力量”，寻找新的代理人，以达到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目的。

美国的垄断财团的智囊机构和基金会组织，如属于索罗斯和哈耶克的右翼基金会，精心培训来自苏联的年轻知识分子，如后

来主张全面放开价格实行“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后来主张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的丘拜斯，向他们灌输特殊配制的政治经济改革药方。比如戈尔巴乔夫时期著名的沙塔林“五百天改革计划”，拟用一年半完全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大规模推行企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完全放开价格和政府管制，等等。美国资本家索罗斯积极参与并资助了“五百天计划”的拟定。索罗斯同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他资助和参与制定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否符合苏联国情不难想像。

彼得·施瓦茨在他的著作《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中总结说：“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

三、苏共失去政权的深刻教训剖析

历史是一面镜子 同时也是一本教科书。

1991年“8·19”事件和不久以后的苏联解体，作为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历史事件之一，引起了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也提出：“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的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认真总结、深刻认识苏共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苏共失去政权的经验教训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 必须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搞好党群关系，尽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向背决定共产党的兴衰成败。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

唯一宗旨，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

列宁认为，党夺取政权后，必须防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党要密切联系群众，搞好党群关系。为了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列宁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带头执行。斯大林上台以后，破坏了列宁时期建立的亲密的党群关系。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各级领导对这个重大问题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官僚作风、腐败之风和脱离群众之风盛行。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党与群众的血肉关系已不复存在。

苏共失去政权的历史教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党的领导层长期脱离广大群众，没有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正确处理好党群关系，党内干群关系疏远造成离心离德，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对共产党不投赞成票。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成熟的群众路线理论。毛泽东同志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也说，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政策的依据。江泽民同志在 199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什么叫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也就能真正掌握和实践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彻底的唯物论，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政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党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永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坚如磐石。”多年来，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进行，我们党之所以坚不可摧，归根到底就在于根植于深厚的群众土壤之中，得到了人民

群众的坚决支持和拥护，真正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此外，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还必须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重要地位。苏共之所以失去民心，以致最后失去政权，其首要的原因就是在苏共执政的 70 多年时间里，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相比较，苏联人民的生活实际上处于贫困状况。苏共由于长期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使人民生活所需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小，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人民群众对苏共领导人作出的提高生活水平的许诺长期不能兑现越来越不满。苏共失去政权的教训从反面给我们警示：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执政党终将被人民所抛弃。①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非常重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是否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评价党的多项工作的根本依据。邓小平同志指出：党领导得好不好，要用生产力和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衡量。增加群众的实际利益，“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②所以，共产党要长期保护自己的政权，就必须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重要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远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2)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共产党永葆生机的动力和源泉。

首先，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决不能搞“意识形态多元化”。

科学的理论是革命政党前进的灯塔和精神动力源泉。马克思

参见刘战主编：《实践“三个代表”巩固执政地位》，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5~217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第 364 页。

主义建党学说认为，共产党是按照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建立起来的，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阐明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只有按照这种理论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消灭落后的社会制度，实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党。从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在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个问题上，苏共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丢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动摇了党的思想基础，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使苏联在很短时间内由“改革”变为“改向”，社会主义大厦顷刻坍塌。戈尔巴乔夫上任不久，就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 1987 年起，他在“多元化”上大做文章，成了第一个提出“多元化”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他的《改革和新思维》一书，强调“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多元化”；“新思维”成为反对派制造动乱的舆论先导。

在“多元化”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多元化”。为确保“意识形态多元化”得到贯彻实施，他首先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体制进行全盘否定。他认为，正是这种体制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受到践踏。因此，应当“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东西”，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代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此后，他严格限制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90 年 6 月 12 日 戈尔巴乔夫批准《新闻出版法》并规定从 8 月 1 日起开始实行。该法宣传“新闻自由”、“舆论不受检查”，

规定公民有“以任何形式，包括通过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发表意见和见解，寻找、选择、获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①

《新闻出版法》实行后，各种腐朽思想，包括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资产阶级专制主义等纷纷出笼，在全苏联迅速传播、泛滥、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是摧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助长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壮大，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导致共产党最终丧失领导权。

其次，必须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的实践，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以来，总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自己的学说不是可以生搬硬套的教条。正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这一内在的理论品质，才使它在诞生后，随着实践、时代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充实新内容、提出新观点、进入新境界、达到新高度。列宁说：“我们绝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②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它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任何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加以对待的做法，都必然葬送马克思主义，葬送社会主义的光明前程。

总结苏共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发现，苏共党内长期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失去了朝气，逐渐走向衰退。列宁所倡导的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斯

参见刘战主编：《实践“三个代表” 巩固执政地位》，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7~148 页。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3 版，第 274 页。

大林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矛盾、在处理党内斗争等问题上都存在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的毛病。赫鲁晓夫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但他一方面仍在不同程度上重犯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的错误，另一方面提出一些违背马列主义的谬论，致使苏共的指导思想更加混乱。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纠正了赫鲁晓夫的某些错误，但不久又为教条主义所困，思想理论更趋僵化、保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革变成改向。

当前，在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如何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科学地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何带领全国人民胜利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执政党必须回答的。江泽民同志回答得好：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看，我们都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和解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要求我们：“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必须坚持按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3) 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廉政建设，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总结苏共失去政权的教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共主要不是被外来的反革命势力推翻的，而是被人民抛弃的；主要不是被敌对势力打败的，而是自行走进了坟墓。

苏共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不仅成为苏共发展和苏联社会发展的障碍，而且使党丧失了自身坚实的立身基础。共产党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就在于人民的支持。失去了这些，自然就失去了

存在的基础。苏共在拥有 20 万左右党员的时候，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拥有 200 万左右党员的时候，战胜了希特勒，而在拥有 2000 万党员的时候，却失去了政权。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自身的腐败。正如苏联解体后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回忆录中所写的：一切都腐败了，一切都在改变。正是由于苏共党内严重的腐败，苏共党组织才失去凝聚力；正是由于苏共党内严重的腐败，苏联人民才对苏共失去信心和信任。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谈到：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时，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据 1991 年的民意调查，对苏共能使国家摆脱危机失去信心的人占被调查者的 64%，对改革成功失去信心的占 52%。大批党员纷纷退党，至 1991 年 7 月，退党人员已达 420 万。^① 这充分表明了能否清除腐败，对执政党来说确实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在近年对党的建设发表讲话时一再强调指出，今后的 10 年、20 年，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党能不能继续执政，能不能使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苏共失去政权后，这个“生死存亡”问题已尖锐地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对于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一直极为重视。1982 年，针对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现实，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2001 年 7 月 1 日，在中

参见刘战主编：《实践“三个代表”巩固执政地位》，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4 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都必须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应该看到，反腐败斗争在我国有长期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期间，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江泽民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增强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同时我们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把反腐败斗争置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之中，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大工作力度，努力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反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既要对自己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采取有力措施，一项一项地进行治理，又要深入研究滋生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4) 必须坚持和正确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防止“一言堂”。

首先，必须坚持和正确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列宁曾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然而，苏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很好地解决民主集中制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好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列宁在强调集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十分强调民主。他指出，无产

阶级政党实行的不是随便什么样的集中制，而是民主集中制。并于1906年4月召开的党的四大把民主集中制写进党章。与列宁不同的是斯大林一贯强调集中，而不讲民主原则。这以后，苏共领导人继续忽视民主问题，从未认真提出过民主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问题，更未从理论上说明没有民主能否建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也曾针对苏共党建模式及政治运行机制的弊端进行改革。如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定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废除干部终身制、宣称要恢复集体领导制。但实际上他仍然经常破坏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勃列日涅夫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党内有不同意见，但个人专权仍是他的基本原则。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化的问题，这击中了斯大林个人集权制的要害。但戈尔巴乔夫对发扬党内民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他只注意要大家解放思想，发表各种新颖意见，却不重视指导。再加上俄国缺乏民主传统，又长期处在个人集权制下，党员的民主意识不高，其结果是个人集权制未能根除，却导致了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并最终导致了苏共失去政权。

苏共长期未能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最后导致党和苏联的瓦解，其经验教训有两点：

一是集中是必要的。在特定的形势下强调集中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过分集中特别是长期的过分集中，不仅会妨碍群众智慧的发挥，破坏集体领导，而且会导致民主集中制的蜕变，个人集权制的建立，会导致党的灭亡。二是民主更是必要的。在共产党执政和领导经济建设时期尤其应大力发扬，但发扬民主应是有领导有步骤的，应从提高党员民主意识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体制两方面入手开展这一工作。

总之，苏共的经验教训表明，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